

儒家民族思想研究

——先秦至隋唐

樊文礼 著

要有两点，其一是「华夷之辨」，其二是「用夏变夷」，其余诸如「尊王攘夷」、「裔不谋夏、夷不乱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以及「修文德以来远人」、「华夷一统」、「夷而近于中国则中国之」、「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等思想主张，都由上述两核心派生发展而来。「用夏变夷」一语最早出自孟子之口，而「华夷之辨」则在孔、孟那里全无依据，是后世儒家对前辈儒家思想的概括和总结。「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都曾被封建统治阶级用来作为制定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每当外敌入侵的时候，「华夷之辨」往往成为中原汉族王朝抵御御行动的号召与旗帜；而当汉族王朝被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征服后，「用夏变夷」又往往成为保护华夏传统文化不被毁灭的一把保护伞。「华夷之辨」的本义是强调各个民族之间的区别，「辨」辨别、分别也。所谓「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其词义本身或起初并无民族歧视的色彩。只是由于华夏（汉族）文化长期以来在总体上一一直处于先进文化的前列，华夏（汉族）以此骄傲和自豪，于是在强调华夷的区别时往往带上了民族歧视的色彩。「用夏变夷」主张用华夏（汉族）文化去改造夷狄（少数民族文化，尽管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时期，少数民族文化在总体上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由先进改造落后具有某种程度的进步性和合理性，但它抹杀了民族的特点，而且各个民族、各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点，因此，「用夏变夷」的论调，终归是一种不平等的民族思想，具有一定的偏见和局限性。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时代，虽然夷狄「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的情况继续存在，但这种「交侵」也促使华夏与夷狄民族融合的不断加深，华夏与夷狄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致人们已经很难从血

加以区别。甚至在

1843772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重点项目

儒家民族思想研究

——先秦至隋唐

B222.05
F092

樊文礼 著



1843772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家民族思想研究:先秦至隋唐/樊文礼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11. 12

ISBN 978-7-5333-2554-1

I. ①儒… II. ①樊… III. ①儒家—民族学—哲学思想—研究—先秦时代~隋唐时代 IV. ①B222.05 ②C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1696 号

儒家民族思想研究——先秦至隋唐

樊文礼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日照日报印务中心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375

插 页 2

字 数 251 千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2554-1

定 价 35.00 元

自序

儒家民族思想是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取得了相当一批研究成果(见本书附录《儒家民族思想研究综述》)。笔者的研究和论述,即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在进入正题之前,首先对以下几个问题做一些说明。

一、中国古代的民族和民族思想形成的时间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国内学术界有关“民族”概念的讨论已经延续了一个多世纪,涉及的领域也几乎涵盖了民族学的各个方面。以往普遍认为,汉语中“民族”一词的出现,是 19 世纪后近代以来的事,如由牙含章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民族”词条的解释是:“在中国古籍里,经常使用‘族’这个字,也经常使用民、人、种、部、类,以及民人、民种、民群、种人、部人、族类等字。但是,‘民’和‘族’组合为一个名词则是后来的事。1903 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梁启超把瑞士—德国的政治理论家、法学家 J. K. 布伦齐利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来

以后，民族一词便在中国普遍使用起来。”^① 近来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南齐书·高逸传·顾欢》中的“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语句为最早可见的现代意义“民族”一词的书面记载。^② 无论“民族”一词在汉语中出现在何时，在中华大地上，民族的形成却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翁独健说：“到了‘五帝’时期之末，我国的民族，不管它叫什么名称，也就形成了，而夏朝的建立则是夏民族形成的标志。”^③ 陈连开认为：“夏、商、周三朝本来都是大融合的产物，为华夏民族雏形，又经历了长达千数年的斗争与融合，到战国时，在春秋300年的民族斗争与融合的基础上，华夏形成为稳定的民族共同体。”^④ 无论是哪种说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我国民族的形成至今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

伴随着民族的形成，人们自然会产生自己（本族）与他人（他族）在语言、服饰、生活习俗等方面有所不同的认识，如同《礼记》所谓“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⑤。不过，对于中国古代民族思想产生或形成的时间，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郝时远认为，《礼记·王制》中关于“五方之民”的记载，“可以说，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2页。

②见黄兴涛：《“民族”一词究竟何时在中文里出现？》，载《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又见邸永君：《“民族”一词见于〈南齐书〉》，载《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

③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以下版本同），第29页。

④陈连开主编：《中国民族史纲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页。

⑤《礼记·王制》，《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以下版本同），第1338页。

这是中国最早具有民族志意义的记录，也是中国传统的‘族类’观念在异文化群体中扩展的标志”^①。陶绪认为：“夷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国文化的演变紧密相连。”夏的建立，“标志着华夏文化中心观念初步形成。此后，用华夏文化中心观作为判断和处理夷、夏之间关系的标准，产生了夷夏文化观念”。^②吴贤哲也说，民族是“随着国家的建立而形成的”。“国家形成之后，民族观及其国家的民族政策也随之产生。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初形成的国家”。^③陈琳国则认为：“春秋时期是华夏族的形成时期，夷夏观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④按：将华夏族形成的时间确定在春秋时期似乎有点过晚。尽管在春秋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原来被称为夷、蛮、戎、狄的不少人融合到华夏族中，但这只是标志着华夏民族的发展壮大，而不是标志着华夏民族的形成。所以，笔者赞同华夏族形成于夏代的说法，即国家的建立标志着民族的形成。但是，民族的形成与民族观特别是较为成熟的民族思想的出现应该有一段距离。如上所述，尽管从逻辑上讲，民族形成后，人们自然会自发地产生本族与他族有所不同的认识，但这些认识未必就能上升到“观念”、“思想”这种理性认识的高度，从自发到自觉、从

①郝时远：《先秦文献中的“族”与“族类”观》，载《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第43页。

②陶绪：《中国古代夷夏观念的形成与发展》，载《中州学刊》1993年第5期同，第126页。

③吴贤哲：《儒家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1卷第9期，2000年。另，曾文芳也认为，夏王朝不仅是古代民族华夏族历史的起点，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民族思想产生的开端，见曾氏著：《夏商周民族思想与政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④陈琳国：《论中国古代民族观的形成和发展》，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第36页。

感性到理性的认识应该有一个过程。“作为一种民族的自我意识，华夷之别的观念可能很早就产生了，而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华夷之辨却是适应‘尊王攘夷’的需要而创造的”^①。而古人有关“华夷之辨”的言论，也主要是从西周末和春秋时期开始的。所以，笔者将中国古代民族思想形成的时间确定在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基本赞同陈琳国的说法。至于儒家民族思想的形成时间，则从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时期算起。

二、对“民族思想”概念的界定和表述

无论汉语中“民族”一词出现在何时，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即在中国古代，人们早已用“华夷”或“夷夏”来指称和表述华夏（汉族）和“夷狄”（其他少数民族）了，所以，古人的民族观往往也就是他们的华夷观或夷夏观。于是，在有关中国古代民族思想的研究中，人们也使用了多种不同的词汇和概念来表述，诸如“夷夏观”、“华夷观”、“民族观”、“族群观”、“民族史观”、“民族关系思想”、“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思想”、“民族思想”等。这些概念既互有联系，又有所区别。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虽然反映了学术研究的活跃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学界还没有就此达成共识，有时甚至会造成人们思想认识上的一些混乱，如往往是使用不同的概念，表达的却是同一种思想；或是同一种思想，使用了不同的概念等。近年来，崔明德与马晓丽、曹鲁超合著的《中国民族思想的学科建设与创新》一书，对规范“民族思想”的概念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作者在第二部分《对民族思想相关

^①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

概念的评析》和第三部分《民族思想的概念》中，对上述种种概念进行了综合分析，指出每种概念的优点和不足。最后，作者对“民族思想”的概念作出了如下的界定：“民族思想是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各类人物对中国民族、民族问题的认识，是处理民族问题、制定民族政策的理论基础；它既有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军事家及普通民众对历史上民族及民族关系的反思，也有他们对当时民族及民族关系现状的理性思考和客观认识，还有他们对民族及民族关系未来发展趋势的预见。”^① 作者认为，“民族思想”概念的内涵比民族观、民族史观、夷夏观、华夷观、民族关系思想等概念的内涵更丰富更宽泛一些。笔者赞同这一说法，所以，在以下的论述中，除一些特定的场合外，一般也都使用“民族思想”这一词汇和概念。

三、本书所指的儒家的范围和儒家 民族思想的核心内容

儒家是春秋末年孔子创立的一个学术派别，到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奉行的官方哲学和指导思想，儒家经典著作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官私教育的主要教科书。所以，本书所指的“儒家”，既包括一些著名的儒家思想家、政治家、学者，也包括一些在儒家民族思想的理论或实践上有所建树的普通儒家士人。这样的安排，或许不至大错。

^①崔明德、马晓丽、曹鲁超：《中国民族思想的学科建设与创新》，齐鲁书社 2007 年版，第 19 页。

儒家民族思想是中国古代民族思想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在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思想中即有所体现，后经历代儒家思想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一个体系较为完整、内容较为丰富的思想理论体系。而在这个体系中，最核心的内容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华夷之辨”，其二是“用夏变夷”，其余诸如“尊王攘夷”、“裔不谋夏、夷不乱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以及“修文德以来远人”、“华夷一统”、“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等思想主张，都由上述两点核心派生发展而来。“用夏变夷”一语最早出自孟子之口，而“华夷之辨”则在孔、孟那里全无依据，是后世儒家对前辈儒家思想的概括和总结。

“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都曾被封建统治阶级用来作为制定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每当“外敌”入侵的时候，“华夷之辨”往往成为中原汉族王朝抵御行动的号召与旗帜；而当汉族王朝被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征服后，“用夏变夷”又往往成为保护华夏传统文化不被毁灭的一把保护伞。

“华夷之辨”的本义是强调各个民族之间的区别。“辨”者，辨别、分别也。所谓“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其词义本身或起初并无民族歧视的色彩。只是由于华夏（汉族）文化长期以来在总体上一一直处于先进文化的前列，华夏（汉族）以此骄傲和自豪，于是在强调华夷的区别时往往带上了民族歧视的色彩。“用夏变夷”主张用华夏（汉族）文化去改造夷狄（少数民族）文化。尽管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时期，少数民族文化在总体上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由先进改造落后具有某种程度的进步性和合理性，但它抹杀了民族的特点，而且各个民族、各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点，因此，“用夏变夷”的论调，终归是一种不平等的民族思想，具有一定的偏见和局限性。

四、儒家民族思想发展的进程

论者将中国传统民族思想或儒家民族观的发展从时间段上划分为春秋战国（形成）、两汉（极大丰富发展）、魏晋南北朝（进一步丰富发展）、隋唐（成熟）、宋元明清（继承、完善及理论总结）几个阶段。^① 不过，就儒家民族思想的具体内容特别是两大核心问题——“华夷之辨”与“用夏变夷”而论，则大体经历了如下发展过程：在民族识别方面，由先秦时笼统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或更加笼统的“夷狄”、“蛮夷”泛称，发展到秦汉以后诸如匈奴、鲜卑、乌桓、突厥、契丹、女真等具体民族；在民族区别方面，由《礼记》中“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②等较为模糊简单的记载，发展到《汉书》中“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③；以及西晋江统《徙戎论》中“言语不通，贄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戎狄志态，不与华同”^④等更为明确而严密的记

①参见崔明德：《中国民族思想的概念及发展脉络》，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4期；李克建：《儒家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西南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89页。其中李克建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合为一段。

②《礼记·王制》，《十三经注疏》本，第1338页。

③《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以下版本同），第3834页。

④《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以下版本同），第1529、1532页。

载。即从种族、地域、语言、生活习俗、经济形态、心理素质等诸方面作为民族区别的标准。这些都属于“华夷之辨”的范畴。至于“用夏变夷”的理论与思想，则大体经历了从孔子时的“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到孟子时明确提出“用夏变夷”的思想；从先秦时的“内诸夏而外夷狄”、对夷狄“正朔所不加”，到汉唐时的“华夷一统”、“夷狄进至于爵”；从先秦汉唐时的“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到金元时郝经提出“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这样几个发展过程。^① 儒家传统的民族思想至此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

本书为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项目名称《儒家民族观研究》。笔者原计划完成一部从先秦至清代的儒家民族思想研究通史，但由于种种原因，只是完成了先秦至唐代部分。妥求补救，俟诸异日。为了给读者一个完整的感觉，在本书《附录》部分的《中国古代儒家民族思想研究综述》中，仍将下限划在了清代，这样的安排，或许也不至多余。

笔者因才识所限，特别是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对笔者还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书中出现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学者予以指正。

樊文礼

二〇一一年七月于烟台鲁东大学寓所

^①参见樊文礼：《中国古代儒家“用夏变夷”思想与理论的变迁》，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先秦儒家的民族思想	1
第一节 孔子的民族思想	2
一、孔子以前的民族思想	2
二、孔子的民族思想	10
第二节 孟、荀对孔子民族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19
一、孟子的民族思想	19
二、荀子的民族思想	24
第三节 《公羊传》的“大一统”和以“尊王攘夷” 为核心的民族思想	28
一、《春秋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	28
二、以“尊王攘夷”为核心的民族思想	31
第四节 《春秋穀梁传》中反映的民族思想	39
一、《穀梁传》与《公羊传》对经文在华夷问题上 解释的异同	40

二、《穀梁传》中所反映的民族思想	44
第二章 汉代儒家的民族思想	57
第一节 贾谊、萧望之与扬雄的民族思想	58
一、贾谊的民族思想	58
二、萧望之的民族思想	64
三、扬雄的民族思想	68
第二节 《春秋公羊传》学派的民族思想	74
一、董仲舒对《公羊传》“大一统” 和民族思想的发挥	74
二、何休的“大一统”思想和“夷狄进至于爵” 的民族观	85
第三节 《盐铁论》中所反映的贤良文学的民族思想	97
一、与匈奴“和亲”的思想主张	98
二、“和亲”的理论基础——“天下一统” 和“修文德”来远人	103
第四节 司马迁、班固的民族思想	107
一、司马迁的民族思想	107
二、班固的民族思想	115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的民族思想	122
第一节 郭钦与江统等人的“徙戎”论	123
一、傅玄与阮种的上书	123
二、郭钦与江统的“徙戎”论	128
第二节 “五胡乱华”期间士人群体的不同态度	135
一、对“夷狄”统治者进行抵制的士人	137
二、主动追随“夷狄”统治者的士人	146

三、被迫与“夷狄”统治者合作的士人	150
第三节 北方士人的“用夏变夷”	155
一、十六国时期的“用夏变夷”	156
二、北魏时期的“用夏变夷”	170
第四章 隋唐时期儒家的民族思想	185
第一节 王通的民族思想	186
一、肯定“夷狄”王朝的合法地位	187
二、在“断南北之疑”上的“情”和“义”	193
第二节 唐贞观四年安置突厥“降户”的讨论	198
一、颜师古与李百药的见解	200
二、温彦博与魏征的论争	202
第三节 士人民族思想在疆域问题上的反映	207
一、温彦博与魏征的分歧	208
二、崔融与狄仁杰的争论	211
第四节 韩愈的民族思想	217
一、“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夷而”二字辨析	217
二、韩愈的“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思想	223
第五节 陈黯的《华心》和程晏的《内夷檄》	231
一、唐代民族融合的新局面	232
二、陈黯的《华心》和程晏的《内夷檄》	235
第六节 士人群体对沙陀政权的认同	238
一、沙陀政权的建立和士人群体对沙陀政权的认同	238
二、士人群体对沙陀和契丹政权采取不同态度的原因	240
附录 中国古代儒家民族思想研究综述	251
一、儒家民族思想的综合研究	251

(一) 儒家民族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演变	251
(二) “华夷之辨”与“用夏变夷”	261
(三) 《春秋》学与“大一统”	266
二、儒家民族思想的断代与个案研究	273
(一) 先秦时期儒家的民族思想研究	273
(二) 汉代儒家的民族思想研究	280
(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的民族思想研究	288
(四) 隋唐时期儒家的民族思想研究	290
(五) 宋辽金时期儒家的民族思想研究	292
(六) 元明清时期儒家的民族思想研究	297
主要参考文献	306
一、典籍	306
二、近人论著	309
(一) 著作	309
(二) 论文	312
后 记	316

第一章 先秦儒家的民族思想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国家。据学者研究，早在新石器时期，居住在现今中国境内的先民们就已形成自己特定的区域，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六大区系。^①到夏商时期，华夏族或华夏族及其四方的夷、蛮、戎、狄组成的五大民族集团正式形成。^②华夏族在此时也已产生了“中国”与“四夷”的观念，进而产生了中国居中，周边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观念。^③

①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载《考古》1991年第12期。所谓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

②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第55页。关于华夷五方格局形成的时间，学界有不同的意见。《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的观点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出现是民族形成的标志的基础之上的。王钟翰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则在综合崔述、童书业、陈连开等人的观点后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诸夏的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较之边疆各族迅速，而华夷统一的历史趋势也越来越反映到各学说中来。于是形成了华夏居中，称为中国，夷、蛮、戎、狄配以东南西北的五方格局。”（第96页）按：华夷五方格局实际形成的时间与人们对它的理性认识应该有一段的距离，故这里采用前一种说法。

③参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第2页。

古籍上所记载的“万邦”、“万国”，则是包括了这五大民族集团的邦国或部落在内。但是，当时人们的民族意识并不很强烈，大约只是意识到周边的人们与己不同而已。《礼记·王制》所谓“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①，大约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周朝建立后，随着统治地盘的进一步扩大，社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视野也进一步开阔，夏夷的区分逐渐明显起来，由此也产生了早期的华夷观或早期的民族思想。不过，当时夏夷尊卑贵贱高下的观念仍不明显，夷夏间的限域也不太严格。^②为夷为夏，认同自选。大约从西周末叶至春秋中叶起，随着各民族上层贵族之间矛盾的不断加深，人们的民族意识开始高涨，夷夏间的界限也严格起来。以下的论述，就从此时开始。

第一节 孔子的民族思想

一、孔子以前的民族思想

孔子出生在春秋末年。关于孔子以前的民族思想，论者或归纳为“以居住地域论民族和论夷夏的思想”、“以生活习俗论民族

^①《礼记正义》卷十二，《十三经注疏》本，第1338页。按：《礼记》虽为后人所撰，但其所反映的当是先民们的一些情况。

^②陈连开：《传统的民族观与中华民族一体观》，载《中华民族研究初探》，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72页。